



聂崇岐的宋史研究

邓智中

摘要:聂崇岐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史学家。他在宋史研究上开拓的有关宋代政治、经济、外交等议题,推进了现代宋史研究的进程。在宋代人物研究领域,他较早梳理了杨家将、尹洙、赵鼎生平事迹,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之志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他受命点校《宋史》,不仅初步标点完《宋史》全书,还在标点过程中撰写了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,这既是其宋史研究的心血结晶,亦是其校勘《宋史》的重要学术成果,为《宋史》点校提供了有益借鉴。聂崇岐在宋史研究上的独到建树,使其无愧于“活宋”之誉,而他的研究路径也为后学带来了若干值得珍视的重要启示。探究聂崇岐的宋史研究成就与思想,既能在观点、思路、方法上获得启迪,也能使学术精神薪火相传,对“他日新宋学之建立”亦将起到积极镜鉴作用。

关键词:聂崇岐;宋史研究;杨家将;点校《宋史》;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

DOI: 10.13734/j.cnki.1000-5315.2024.0704

收稿日期:2022-10-22

作者简介:邓智中,男,四川泸州人,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,E-mail: dzzgsxs@163.com。

聂崇岐(1903—1962),字筱珊,河北藁县人,中国近现代史学家。他苦读治学,曾说,“用书治饿,既省了钱,又得了学问,也是一大收获”^①。他因家庭窘迫,往返步行 12 华里上学,四年如一日,乡里人说,“筱珊在中学时代就已显示终生走学术道路的志向”^②。聂崇岐进入燕京大学后,在洪业的安排下,主攻宋史,兼及官制史、中国史学史以及版本目录学,治学领域较为宽广。聂崇岐在引得编纂、文献整理方面的贡献已为学界所关注,而他在宋史研究上的成就则尚有未发之覆^③,故笔者不揣简陋,汇集相关文献,对此问题作一探讨。

一 开拓重要议题

聂崇岐治史,尤重史识,在宋史研究上精深独到^④。他“重视从整体上把握宋代”^⑤,这为其全面考察宋代历史,开拓重要历史议题提供了较为宏阔的学术视野。经蔡美彪整理出版的《宋史丛考》,收录了聂崇岐生前发表的部分文章,其中与宋代相关的论文有 10 篇,如《宋词科考》、《宋代制举考略》、《宋役法述》、《宋史地理志考异》、《宋辽应聘考》等,几乎涉及有宋一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等各个方面^⑥。《宋史丛考》虽是后人整理出版,但仍可窥见聂崇岐在赵宋史事研究上的取法路径。通观聂崇岐上述文章,多为宋史相关领域的开拓

①段昌同《聂崇岐先生生平轶事》,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《燕大文史资料》第 3 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,第 300 页。

②聂宝璋《学者风范长存——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》,《近代中国》1998 年第 8 辑,第 261 页。

③关于讨论聂崇岐宋史研究的文章,可参见:闻黎明《聂崇岐》,刘启林编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,第 267—274 页;段昌同《聂崇岐先生生平轶事》,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《燕大文史资料》第 3 辑,第 300—301 页;聂宝璋《学者风范长存——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》,《近代中国》1998 年第 8 辑,第 265—272 页;夏自强《功不可没的聂崇岐教授》,张世林编《学林往事》中册,朝华出版社 2000 年版,第 1000—1004 页;夏自强《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》,燕京研究院编《燕京学报》新 14 期,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,第 208—213 页;丁磐石《严谨治史 澹宁做人——记聂崇岐先生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编《学问人生(续)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(上)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,第 95—97 页。

④闻黎明《聂崇岐》,刘启林编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》,第 267 页。

⑤夏自强《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》,燕京研究院编《燕京学报》新 14 期,第 208—209 页。

⑥聂宝璋《学者风范长存——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》,《近代中国》1998 年第 8 辑,第 265 页。

之作^①。以下举例略作论证。

宋辽关系是宋代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,影响着北宋的政治走向。过往学者多将目光聚焦于宋辽之间的军事对抗,而对两国间的和平交往则少有问津。事实上,宋辽之邦交,“综一百六十五年中,两朝平时期为百二十二年,其失和者仅四十三年而已”^②,和平才是宋辽两国关系的主旋律。1939年,聂崇岐应《燕京学报》之约^③,草成讨论宋辽交往的《宋辽交聘考》,并发表在该刊1940年第27期上^④。

宋太祖开宝七年(974)十一月,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权知雄州、内园使孙全兴,希望两朝重修旧好,太祖“命全兴答书,并修好焉”^⑤。开宝八年,宋遣使赴辽,“是为两朝正式通聘之始”;宋辽初和,双方即互通庆吊;澶渊盟后,两国信使往来更加频繁。聂崇岐即根据往来使节任务将使节分为贺正旦国信使(正旦使或贺正使)、贺生辰国信使(生辰使)、告哀使、皇帝登宝位国信使(告登位使)、祭奠国信使(祭奠使)、吊慰国信使(吊慰使)等十二种^⑥。聂崇岐的这些归纳总结为学界研究宋辽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,1984年出版的《中国历史大辞典·宋史卷》就基本因袭了他关于“国信使”定义的解释^⑦。实际上,除了“国信使”,辞典中的其他相关使节概念亦多沿袭自《宋辽交聘考》(见表1)。

表1 部分使节概念对照表^⑧

使节名称	《宋辽交聘考》	《中国历史大辞典·宋史卷》
贺正旦国信使(正旦使或贺正使)	贺邻邦皇太后、皇帝或皇后正旦者,曰贺正旦国信使,简称正旦使或贺正使。	官名。宋、辽与宋、金间向对方皇太后、皇帝或皇后祝贺正旦的使臣,简称正旦使或贺正使。正旦使,见“贺正旦国信使”。
贺生辰国信使(生辰使)	贺邻邦皇太后、皇帝或皇后生辰者,曰贺生辰国信使,简称生辰使。	官名。宋、辽与宋、金间祝贺对方皇太后、皇帝或皇后生辰使臣,简称生辰使或生日使。生辰使,见“贺生辰国信使”。
祭奠国信使(祭奠使)	奠祭邻邦大行皇太后或皇帝者,曰祭奠国信使,简称祭奠使。	官名。宋、辽间祭奠对方亡故皇太后或皇帝的使臣,简称祭奠使。宋、金间称吊祭使。

在此基础上,聂崇岐细致探讨了使节选派、国书体制、礼物名色、使节接送、使节待遇等问题,帮助人们于纷乱杂陈的史实中抓住主线。以宋朝使节选派为例。历来外交选人是国之大事,关系国家荣辱,对赵宋来说尤其如此。宋朝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,与其先后并存的有辽、夏、金以及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,这些政权给宋代带来了沉重的外部压力^⑨。身处外部压力之下的宋廷,若外交选人失当,引发事端,势必于统治不利。因此,聂崇岐指出,“宋遣国信使副,例由中书枢密会同审择,进名请旨”,当然其中也有“不遵彝典”及“特副使中似颇有勋戚子弟滥竽充数者”,但就总体而言,“宋之大使,大半皆知名士”^⑩。聂氏的论断,使学界对宋代使节选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^⑪。又如澶渊之盟,“辽帝以兄礼事宋帝,于是后人遂多以为宋辽永为兄弟之国者”,对此一陈说,聂先生征诸史籍,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了“两朝继统之君,由宋人著述,知系伯叔祖孙,昭穆相序,并非凡宋帝皆为兄,辽主皆为弟;其相互称谓,乃以君王本身为单位,并非以国为单位者”^⑫,这对

①夏自强亦有相关论述,他说:“聂先生撰写论文的选题具有独创性,多是前人未曾涉猎或是未曾注意的重要问题。”参见:夏自强《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》,燕京研究院编《燕京学报》新14期,第210页。

②聂崇岐《宋辽交聘考》,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下册,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286页。

③王蕾、梁益铭、肖鹏《聂崇岐致顾廷龙信札考释(1939—1958年)(二)》,《高校图书馆工作》2021年第3期,第73页。

④聂崇岐《宋辽交聘考》,《燕京学报》1940年第27期,第1—51页;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下册,第283—375页。

⑤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5,开宝七年十一月甲午、辛丑,中华书局2004年版,第328页。

⑥聂崇岐《宋辽交聘考》,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下册,第284、286、286—287页。

⑦参见:贾玉英《宋辽交聘制度论略》,《中州学刊》2005年第6期,第171页。

⑧分别参见:聂崇岐《宋辽交聘考》,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下册,第287页;《中国历史大辞典·宋史卷》编纂委员会编《中国历史大辞典·宋史卷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,第364、83、364、96、430页。

⑨邓小南《宋朝的再认识》,邓小南等《宋: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,第2—3页。

⑩聂崇岐《宋辽交聘考》,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下册,第288页。

⑪如陶晋生在《宋代外交史》中写道:“宋使节主要由宰辅或枢密院选派,有时候宰辅或枢密院提出名单由皇帝选用,有时也会出现内廷徇私点派或大臣子弟滥竽充数的情形,但大致都选用知名贤臣。”参见:陶晋生《宋代外交史》,重庆出版社2021年版,第80页。

⑫聂崇岐《宋辽交聘考》,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下册,第294页。

深入研究宋辽国书体制具有启发作用^①。为方便读者充分了解宋辽使节概况,聂崇岐还于正文后附录生辰国信使副表、正旦国信使副表、祭吊等国信使副表和泛使表^②,探赜索隐,钩深致远,更见其匠心独运,用功之深^③。宋辽邦交是宋代最主要的外交关系之一。聂崇岐认为,宋辽间“周旋聘问之仪,揖让进退之节,较之各朝尤多创举,制度规程颇有可述”^④,于是他参稽各种著作,将宋辽交聘关系连缀成篇,这既是其史识的表现,也是其接续之前的民族关系研究,更是其在宋史研究上的独到建树。

除了《宋辽交聘考》,聂崇岐的其他文章也对宋代制度进行了仔细考察,颇能反映他对于宋史研究的开拓之功。比如他应顾颉刚之嘱而作的《宋史地理志考异》,甫一发表,即引起当时学术界的广泛关注,并被开明书店印行的《二十五史补编》收入^⑤;承《宋史地理志考异》之余蕴,他的《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》一文则考订了宋代府州军监置废、升降、更名等问题^⑥。这两篇文章纠正了《宋史·地理志》的若干讹谬,对于今日研究宋代历史地理和宋代地方官制颇具学术价值。两宋赋税制度以复杂多变著称,他的《宋役法述》一文则“第一次全面考察了宋代役法制度的变迁”^⑦，“极富教益”^⑧。《宋代制举考略》、《宋词科考》两文分别讨论了选拔非常人士的制举和选拔代言之人的词科,是“宋代科举制分科研究的开创之作”,《宋词科考》更“创个案研究之先例”^⑨。凡此种种,无不证明其在宋史研究上的开拓性贡献。值得注意的是,聂崇岐的宋史研究多侧重于制度,以考察制度源流为指归^⑩。

此外,聂崇岐还对宋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梳理。“杯酒释兵权”与“罢藩镇”是宋初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,对北宋政治的影响不言而喻,但世人多将二者混为一谈,“以为‘杯酒释兵权’即罢藩镇”,聂崇岐却在爬梳相关材料后明确指出,“宋太祖之‘杯酒释兵权’,即罢宿将典禁兵,与罢藩镇乃截然二事”。随后,他详细论述了太祖收兵权的过程:自五代以来,中央禁兵常以拥戴之功发动政变,而通过掌握禁兵登基称帝的宋太祖赵匡胤,自然对“惯于翻覆之禁兵”心存戒心,遂用赵普之计,“罢宿将典禁兵,即世人所熟知之‘杯酒释兵权’是也”;“腹心之患”既除,接下来就是解决“肢体之患”的藩镇,宋太祖以“夺其权柄,制其钱谷,收其精兵”为纲,采取“添置通判与罢领支郡”等一系列措施,“清扫百余年来藩镇之患”^⑪。“杯酒释兵权”是否实有其事,或可再做探讨,但聂崇岐准确区分了“杯酒释兵权”和“罢藩镇”^⑫二史事,为研究宋代政治制度史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又如,以往多认为在宋太祖时就完成了罢藩镇政策,但聂崇岐说“此种政策之完成盖已在真宗之世”^⑬,这一观点更见其目光深邃、见解独到^⑭。

综上所述,聂崇岐探讨宋史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敏锐的学术眼光^⑮。他往往能抓住天水史事的重要问题而溯源察终,分析始末,不仅开拓了宋史研究上的重要议题,也“推进了宋史研究的进程”^⑯。由于聂崇岐在1949年以后侧重于资料编纂和官制研究,较少再对宋史中的其他重要问题作深入考察,难免有所缺憾。

① 苗润博《宋辽国书考述》,刘宁编《辽金历史与考古》第3辑,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,第157页。

② 聂崇岐《宋辽交聘考》,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下册,第333—375页。

③ 夏自强《功不可没的聂崇岐教授》,张世林编《学林往事》中册,第1002页。

④ 聂崇岐《宋辽交聘考》,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下册,第283页。

⑤ 聂崇岐《宋史地理志考异》,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下册,第493—563页。

⑥ 聂崇岐《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》,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上册,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70—126页。

⑦ 包伟民《唐宋转折视野之下的赋役制度研究》,《中国史研究》2010年第1期,第17页。

⑧ 葛金芳《中国近世农村经济制度史论》,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,第268页。

⑨ 傅璇琮《祝尚书〈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〉序》,傅璇琮《学林清话》,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,第258页。

⑩ 这一点已为学者关注,相关讨论可参见:闻黎明《聂崇岐》,刘启林编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》,第268页;聂宝璋《学者风范长存——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》,《近代中国》1998年第8辑,第265—267页;夏自强《功不可没的聂崇岐教授》,张世林编《学林往事》中册,第1001页。

⑪ 聂崇岐《论宋太祖收兵权》,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上册,第263、270、281、266、275页。

⑫ 王育济《论“杯酒释兵权”》,《中国史研究》1996年第3期,第116页。

⑬ 聂崇岐《论宋太祖收兵权》,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上册,第263、281、282页。

⑭ 张邦炜将其视为《论宋太祖收兵权》一文中颇为重要的结论之一。参见:张邦炜《重文轻武:赵宋王朝的潜规则》,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5年第1期,第140—141页。

⑮ 这或许与聂崇岐读过数学系有关,数学教育培养了他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。参见:聂宝璋《学者风范长存——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》,《近代中国》1998年第8辑,第271页。

⑯ 夏自强《功不可没的聂崇岐教授》,张世林编《学林往事》中册,第1000页。

二 探讨宋代人物

聂崇岐在对宋代各方面展开探究的同时,对宋代历史人物也有所关注。从编纂《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》、《琬琰集删存附引得》等若干宋人引得,到简评《宋人轶事汇编》等,均可看到宋代人物在其治史实践中的特殊位置。现存他研究宋代人物的文章有四篇,即《麟州杨氏遗闻六记》(1939)、《尹洙之年寿》(1940)、《赵忠简公画像跋》(1944)、《〈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〉正误》(1947),这些文章多是探讨宋代人物的生平事迹。

北宋杨业一门抗辽之事,经后世演绎成家喻户晓的“杨家将”。这一野史巷谈,本不足信,但正史记载简略,难窥事实曲折。故聂崇岐将多年来收集的杨业祖孙父子之事连缀成文,写成了《麟州杨氏遗闻六记》。该文由记入宋前之杨业、记杨业战死以后、记契丹之重杨业等六部分组成,全文综合多种材料,辨析了若干史事,比如通过欧阳修《文忠全集》、《资治通鉴》考证出杨业“本贯应为麟州”等^①。《麟州杨氏遗闻六记》是聂崇岐的第一篇宋代人物论文,也是现代史学意义上的关于杨业或杨家将的重要学术论文。在这之后,瞿宣颖《记杨家将》(1942)^②、卫聚贤《杨家将及其考证》(1943)和《杨家将考》(1944)等论著才相继问世^③。与聂崇岐实证研究人物不同,翦伯赞则是“用文学作品订正和丰富历史”^④,其发表的《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》一文,梳理了杨家将故事的发展过程,并就戏曲小说与《宋史》互异之点探讨了如杨家将家世、杨业战死陈家谷之役等问题^⑤。文学作品虽具通性真实^⑥,但毕竟不是历史的客观反映,用以订正历史,恐难免枘凿之病。于是,聂崇岐又作《〈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〉正误》一文,对翦文讹误予以商榷,指出杨延朗改名杨延昭乃“避宋圣祖赵玄朗之名”,翦文将深恶“五鬼”的马知节列入“五鬼”之列实乃错误^⑦,这些均证明聂崇岐对杨家将史实的熟稔。《麟州杨氏遗闻六记》、《〈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〉正误》二文,不仅厘清了相关事实真相,而且对学界深入开展杨家将研究也有启迪意义。

宋代“与士大夫治天下”^⑧,文人居于重要地位。相较于那些青云直上、一展宏图的文人士大夫而言,尹洙,则显得不幸。尹洙,字师鲁,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。“西北久安,洙作《叙燕》、《息戍》二篇”^⑨,力主加强武备以抵御西夏。尹洙“资兼文武,徒以遭时不偶,未竟其用,颠连困蹶,抑郁以终,实北宋政治上一大损失也”,尹洙卒后,其友人韩琦、欧阳修记其年寿互有差异,未知孰是孰非,聂崇岐征诸文献,考证出尹洙生于咸平四年(1001)、卒于庆历七年(1047),和韩说相符,并指出欧说或是“后世钞胥或手民之过”,非欧阳修之误^⑩。实际上,清代学者钱大昕亦曾对尹洙之年寿提出质疑,但他只写下“年四十七。欧阳修撰《墓志》,作四十六”^⑪两句话,并没有就此展开论证。聂崇岐的文章则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全盘细致的考辨,是对钱氏推论的具体化。而尹洙之年寿问题,经聂崇岐考证得到解决,其结论也为徐规、孙云清等学者所接受^⑫。

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爆发,大量私家藏品流入市场,不少知识分子积极购买收藏,而北平购买古玩书画之风尤盛^⑬。聂崇岐就杜伯秋处所藏之赵鼎画像写下的跋语,是为《赵忠简公画像跋》。全文虽是跋语,但聂崇岐对赵鼎和赵鼎所穿宋代朝服、题字的正确与否以及画像绘成年代、流出源头、宋代官制等进行了简要考订,

① 聂崇岐《麟州杨氏遗闻六记》,《史学年报》1939年第3卷第1期,第63—70页;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下册,第367—387页。

② 经查原刊,此文原题《杨家将》,系瞿宣颖《养和室随笔》之一节,载《中和月刊》1942年第3卷第9期,第94页。

③ 参见:方建新《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,第1148、1367页。

④ 徐国利《中国现代史家论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及其史学实践》,徐国利《中国现代史家思想与现代史观研究》,黄山书社2016年版,第147页。

⑤ 翦伯赞《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》,《中原》1945年第2卷第1期,第41—47页。

⑥ 石泉、李涵《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》,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《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,第33页。

⑦ 聂崇岐《〈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〉正误》,《益世报》1947年9月16日,第6版。

⑧ 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21,熙宁四年三月戊子,第5370页。

⑨ 脱脱等《宋史》卷295《尹洙传》,中华书局1977年版,第9831页。

⑩ 聂崇岐《尹洙之年寿》,《史学年报》1940年第3卷第2期,第73、74页。

⑪ 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(下)》卷77《宋史十一》,方诗铭、周殿杰校点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,第1069页。

⑫ 参见:徐规《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》,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,第200页;孙云清《〈梦溪笔谈〉记事订误十二则》,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编《沈括研究》,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第229页。

⑬ 王蕾、梁益铭、肖鹏《聂崇岐致顾廷龙信札考释(1939—1958年)(二)》,《高校图书馆工作》2021年第3期,第74页。

不仅想要“借此像”略窥“宋代朝服”，更是感叹“书香世家，乃任其祖先遗影流落他乡”^①，对今人梳理赵鼎其人其事颇有参考价值。

透过上述几篇文章，可以清楚地看到聂崇岐研究的宋代人物多与兵事相关，且发表时间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（订误可视为是前一篇的继续和发展）。那么，聂崇岐何以会较为关注这些历史人物呢？

“古人著书立说，皆有所为而发”^②。其时，北平沦陷，燕京大学因其特殊地位得以存留办学。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，打破了燕园的宁静，日军迅速占领燕大，并将洪业、邓之诚等燕京学人逮捕入狱。失业在家的聂崇岐，也难逃厄运。他于1942年“七月廿三日蒙难，至本月（八月——引者注）七日始释”^③。爱国情怀下的聂崇岐，不但坚拒敌伪拉拢^④，还借史论抒发自己满腔的报国热情。不管是杨家将、赵鼎，还是尹洙，均主张反抗侵略，他们都是国家的脊梁，“苟师其德业，可以治国字人；慕其风范，可以激贪励俗”^⑤。深研宋史的聂崇岐，以史抗战，贬斥势利、尊崇气节，继承了两宋史学家的忧患意识，也是天水一朝之文化于治道学术裨益的体现^⑥，更是“一个现代爱国史家对祖国和中华民族应尽的一份义务”^⑦。抗战胜利后，聂崇岐“本痛定思痛之旨”，仅用四个月时间就编写出《九一八至双九日寇侵华大事纪》，“用资警惕”^⑧，展现出宋代士大夫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责任与担当，与严复所言宋人造就中国今日之现象冥合^⑨。所以，聂崇岐笔下的这些宋代人物，不仅是研究之需，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有感而发，更是宋人精神在其身上人格化的体现。

此外，聂崇岐在其他文章中也对宋代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。北宋杰出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因一意革新旧制而被时人戏称为“拗相公”，但聂崇岐认为：“王安石之不为浮言所动，正足见其坚毅不拔；所谓‘拗’者，无非恶之者所加之恶名词耳。若云新法流弊已见，而仍不恤人言，已超越坚毅程度，足可及于‘拗’境。则旧法之病民更甚，亦两害相权取其轻者之意而已；况新法流弊固随时予以纠正，并非任其自然乎？”^⑩又如北宋开国功臣赵普，他评价道：“赵普一学究耳，然能谋深虑远如此，亦不可谓非人杰。若其天性伎刻，睚眦必报，且使秦王光美不得其死，为人固多有可议者。第过不掩功，况过又率属私行，而功则在生民与社稷乎？”^⑪这些叙述虽然不长，但是持论公允^⑫，颇有见地。

在聂崇岐撰写的宋史论文中，历史人物并不占多数，却是20世纪以来较早对杨家将、尹洙、赵鼎进行探讨的宋史学者^⑬，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应忘怀。此外，他对于历史人物、时代背景与历史人物关系的关注，也值得大家适当反思。应该承认，自梁启超揭橥“新史学”的大旗以来，以“事”或以“问题”为本位的史学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，但亦有不足之处，这要求重新重视作为史学活动主体的“人”^⑭。

三 点校《宋史》

元修《宋史》成书仓促，讹误错漏不堪，为历代治宋史者所诟病。聂崇岐对《宋史》也多有批评，他说：“《宋

① 聂崇岐《赵忠简公画像跋》，《汉学》1944年第1辑，第225—230、227、230页。

② 陈寅恪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》，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，第279页。

③ 沈津编著《顾廷龙年谱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257页。

④ 闻黎明《聂崇岐》，刘启林编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》，第275—276页。

⑤ 刘知幾著、浦起龙通释、王煦华整理《史通通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221页。

⑥ 陈寅恪《赠蒋秉南序》，《陈寅恪集·寒柳堂集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，第182页。

⑦ 王曾瑜《治辽宋金史杂谈》，《河南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10年第3期，第5页。

⑧ 聂崇岐《九一八至双九日寇侵华大事纪》，《大中》1946年第1卷第1期，第45页。另见：夏自强《功不可没的聂崇岐教授》，张世林编《士林往事》中册，第1008页。

⑨ 严复《与熊纯如书》，王栻编《严复集》第3册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668页。

⑩ 聂崇岐《书评：The Gay Genius: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》，《燕京学报》1948年第34期，第299—300页。

⑪ 聂崇岐《论宋太祖收兵权》，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上册，第282页。

⑫ 夏自强《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》，燕京研究院编《燕京学报》新14期，第212页。

⑬ 可参阅：方建新《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618、1148、1200、1367页。按：在“赵鼎”栏，方建新将方健1985年发表的《赵鼎主守投降说质疑》列为该栏第一，而聂文发表于1944年，在时间上早于方文。

⑭ 参见：王汎森《人的消失?! ——兼论20世纪史学中“非个人性历史力量”》，王汎森《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：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，第314—350页。

史》久以芜杂乖谬著”^①，“错乱牴牾，不一而足，难为典据”^②。聂崇岐遂有志匡补史书缺漏，以求正本清源，《宋史地理志考异》、《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》即是其补正《宋史·地理志》的重要尝试。但《宋史》一书，“于诸正史中，卷帙最为繁多”^③，再加上编纂引得等其他原因，聂崇岐始终未能如愿。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新生的国家政权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和动员力，为大型文化典籍的整理提供了重要保障，而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也曾对古籍整理作出过相关指示。1958年，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应运而生，聂崇岐成为历史组的成员之一。在此背景下，标点“二十四史”工作逐步展开。根据工作安排，《宋史》由夙治宋史的聂崇岐负责点校。

一般情况下，整理古籍要用校勘精审、比较接近原书面貌的善本作为底本。《宋史》版本众多，有至正本、成化本、南监本、北监本等。在仔细对比各版本的优劣后，聂崇岐初定“元至正本，也是《宋史》的祖本”作为底本^④。民国时期，张元济曾在上海影印过百衲本“二十四史”。百衲本“二十四史”充分吸纳了不同本子的优点，又集传统版本、目录、校勘学之大成，极富学术价值^⑤。百衲本《宋史》“是用元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，又同殿本作了对校，修补和改正了某些错字”^⑥，是较为理想的校勘底本。因此，聂崇岐最终选定百衲本《宋史》作为底本^⑦，这也奠定了今本《宋史》的版本基础。

《宋史》底本既已择定，接下来就是对其进行校勘。古籍校勘，主要是订正一部古籍中的衍、讹、脱、倒等问题。为此，聂崇岐制定了精密细致的《校勘宋史凡例》(下简称《凡例》)，作为自己的工作指引。《凡例》就点校方法、操作规范等作了相应的规定和说明，是聂崇岐点校《宋史》的纲领性文件。由《凡例》可知，聂崇岐主要采用陈垣提出的“他校”、“本校”等“校法四例”^⑧，但其中也有一些自己的经验所得，并非全盘借鉴，没有自己的主张。此外，他主张在尊重学术规范的前提下，充分吸收前人的校勘成果。由此可见，聂崇岐试图综合运用多种整理方法，以期能全面更正《宋史》讹误。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，聂崇岐积极投入到点校《宋史》工作中。但因身体原因，他不幸于1962年4月17日午夜悄然离世，《宋史》点校也随之中辍。

聂崇岐逝世后，从1963年起由罗继祖、邓广铭继续点校《宋史》，后受环境影响而被迫停止。1971年，标点工作重新启动，但工作组将《新唐书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、《旧五代史》、《宋史》转移到上海进行，并将相关点校材料一并移交上海以供参考^⑨。6月，标点《宋史》工作正式开始，程应镠等负责点校。8月4日，程应镠在家信中写道：

从北京带来聂崇岐、邓广铭等人点校的《宋史》。我取出两卷和我校点过的对了一下，在主要问题方面，我和他们校的是相同的，在次要问题方面(即读得通，点得断的方面)，则各有所遗漏。^⑩

聂崇岐在去世前已经初步标点完《宋史》全书，并“写出一些校勘记样稿”^⑪，这些样稿的大致内容可从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中看到^⑫。如信所言，上海工作组在点校过程中参考了聂崇岐、邓广铭等人点校的《宋史》稿本。因此，今本《宋史》吸收了聂崇岐的点校成果，或无异议。以下略举几例试作论证。

咸平三年(1000)春正月，益州发生叛乱。宋真宗“诏户部使雷有终为泸州观察使，帅师会李惠等讨之”^⑬。“泸”，《宋史》原作“庐”。宋代益州，即今四川成都；泸州，指今江阳、合江等地；而庐州则是今安徽合肥一带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(以下简称《长编》)载：“上始闻王均反，即以户部使、工部侍郎雷有终为泸州观

① 聂崇岐《宋代制举考略》，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上册，第175页。

② 聂崇岐《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》，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上册，第70页。

③ 陈寅恪《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》，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第277页。

④ 聂崇岐《聂崇岐先生〈校勘宋史凡例〉》，《书品》2007年第2辑，第92页。

⑤ 聂激萌《重新发现的百衲本〈北齐书〉〈周书〉〈北史〉校勘记述论》，《文史》2021年第2辑，第103页。

⑥ 中华书局编辑部《出版说明》，脱脱等《宋史》，第4页。

⑦ 闻黎明《聂崇岐》，刘启林编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》，第272页。

⑧ 聂崇岐《聂崇岐先生〈校勘宋史凡例〉》，《书品》2007年第2辑，第92页。

⑨ 王芳军《二十四史工作汇报》，《书品》2011年第6辑，第87页。

⑩ 虞云国编著《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316—317页。

⑪ 中华书局编辑部《出版说明》，脱脱等《宋史》，第4页。

⑫ 聂崇岐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仅太祖至孝宗朝，即卷1至卷33。参见：聂崇岐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，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下册，第399—492页。

⑬ 脱脱等《宋史》卷6《真宗一》，第111页。

察使、知益州，兼提举川、峡两路军马招安巡检捉贼转运公事。”^①《宋史·雷有终传》也有相关的一条材料：“即日，拜有终泸州观察使、知益州兼川峡两路招安捉贼事。”^②益州发生叛乱，应该就近派兵镇压，若从千里之外的庐州调兵，恐远水救不了近火，而泸州在地理位置上与成都较为接近，可以及时发兵平叛。同年九至十月，雷有终率军收复失地，而贼首王均亦在不久后“穷蹙缢死”^③。所以，聂崇岐根据《长编》和《宋史·雷有终传》，将“庐州”改为“泸州”。聂崇岐校勘记：“《续长编》卷四六，页六上，作泸州观察使。《宋史》卷二九八《雷有终传》亦作泸州，应改。”^④今本《宋史》所作校勘亦是如此：“‘泸’，原作‘庐’，据本书卷二七八《雷有终传》、《长编》卷四六改。”^⑤由此可见，两者校勘记相符。

又如高怀德，北宋名将，宋太祖重要的从龙功臣。赵宋代周后，赵匡胤论功封赏。据《宋史·太祖本纪一》载：“（以）江宁军节度使、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。”^⑥事实上，《宋史》这条关于高怀德的记载亦有问题。对此，聂崇岐写出如下校勘记：

《续长编》卷一，页五下，“常山高怀德自江宁节度使为义成军节度使；……辽人张光翰……为宁江军节度使。”《东都事略》卷二一，页二下，《高怀德传》作“宁江军节度使”。《五代会要》卷二四，页七下，夔州于后唐天成二年七月升宁江军节度。至江宁军，唐曾置于升州，不久废。（）升于五代时为南唐都，无江宁军之号。故凡《宋史本纪》及《高怀德传》之作江宁者皆倒误。又毕氏《续通鉴》正本直书宁江军节度使……常山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。附《考异》云：“《宋史·太祖纪》、《高怀德传》皆作江宁，考其时升州未入版图，亦尚无江宁军之名，当是宁江之误。宁江者夔州军号也。怀德易镇而以张光翰代之。《长编》于光翰书宁江，怀德书江宁，盖传写有誤耳。今皆改从宁江军，庶无歧混。”《考异》云宁江误作江宁是，但云“升州未入版图，亦尚无江宁军之名”亦误。盖下南唐后，改称升州，后以仁宗潜邸始升为江宁府建康军节度，盖无江宁军号也。^⑦

而今本《宋史》作出的校勘如下：

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（以下简称《长编》）卷一，在“高怀德”条作“江宁军”，在“张光翰”条又作“宁江军”。毕沅《续资治通鉴》（以下简称《续通鉴》）卷一《考异》说：“考其时升州未入版图，亦尚无江宁军之名，当是‘宁江’之误。宁江者，夔州军号也。怀德易镇，而以张光翰代之。《长编》于光翰书‘宁江’，怀德书‘江宁’，盖转写有誤耳。”^⑧

两相比较，一目了然，今本《宋史》除了没有使用《东都事略》和《五代会要》的相关史料，其他则与聂崇岐所出校勘基本一致。

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是聂崇岐以《长编》、《续资治通鉴》、《东都事略》等若干史料校点《宋史》本纪时写成的校勘札记^⑨。聂氏就《宋史》所载逐条对读、仔细审校，并用扼要文字将有问题的地方一一标出^⑩，可靠的史料来源、科学的校勘方法、严谨的工作态度为其论断提供了有力支撑。为更好地论证，现将今本《宋史》卷1至卷33和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的校勘记对比统计如表2。如表2所示，今本《宋史》卷1至卷33校勘记凡302条，其中118条与聂著校勘札记相似或相同，聂崇岐的校勘记当是今本《宋史》的重要参考之一。或正因为如此，《宋史》重印版在《出版说明》中说：“本书原由聂崇岐（岐）同志负责点校，初点已经完成，并写出一些校勘

①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46，咸平三年正月甲午，第989页。

②脱脱等《宋史》卷278《雷有终传》，第9457页。

③脱脱等《宋史》卷278《雷有终传》，第9459—9460页。

④聂崇岐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，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下册，第422页。另，《雷有终传》在百衲本《宋史》卷278，此处写成卷298，未知何故。参见：脱脱等《宋史》卷278《雷有终传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，第1a、7a页。

⑤脱脱等《宋史》卷6《真宗一》，第119页。

⑥脱脱等《宋史》卷1《太祖一》，第5页。

⑦聂崇岐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，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下册，第399页。

⑧脱脱等《宋史》卷1《太祖一》，第19页。

⑨闻黎明《聂崇岐》，刘启林编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》，第272页。

⑩闻黎明《聂崇岐》，刘启林编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》，第272页。

记样稿。”^①这即是对他工作的肯定和对他的告慰。

表 2 校勘记统计表^②

单位:条

本纪	书名	校勘记	官、制	地理	时间	人、物
太祖	《宋史》	31	6	13	2	10
	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	15	4	8	2	1
太宗	《宋史》	13	3	4	1	5
	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	7	2	1	0	4
真宗	《宋史》	32	9	13	1	9
	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	15	5	9	1	0
仁宗	《宋史》	37	11	10	2	14
	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	14	6	5	1	2
英宗	《宋史》	0	0	0	0	0
	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	0	0	0	0	0
神宗	《宋史》	23	10	7	0	6
	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	14	4	4	0	6
哲宗	《宋史》	25	11	6	1	6
	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	14	6	3	1	4
徽宗	《宋史》	20	7	6	0	7
	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	7	3	1	1	2
钦宗	《宋史》	15	7	2	0	6
	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	3	2	0	0	1
高宗	《宋史》	100	16	24	6	54
	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	28	5	9	3	11
孝宗(一)	《宋史》	6	2	0	3	1
	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	1	0	0	1	0
合计	《宋史》	302	82	85	16	80
	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	118	37	40	10	31

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“虽是未完成的手稿”，但读来使人“心悦诚服，拍案叫绝”，是聂崇岐校勘《宋史》的学术成果^③，不仅对当时的点校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，对今人修订《宋史》亦富有参考价值，而且也是聂崇岐宋史研究的心血结晶，文中对史事、人物、职官、地名等相关问题的考证，为现代宋史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。

除了研究宋史，聂崇岐也在燕大开设宋史课程，指导学生研究宋史。如指导谢桢撰《元祐党人碑》，缪希相(后改名李涵)撰《范仲淹评传》，陈公柔撰《熙宁变法在财政上之收获及对后来之影响》^④，这些题目均是有宋一代政治上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和事件，亦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。不少学生因此走上学术道路，以学术作为一生追求。李涵即成为著名的宋辽金元史学家。聂崇岐的宋史研究也因燕大的跨国交流活动，影响及于海外。美国历史学家柯睿格于1936年至1940年访学燕京研究宋史，其真正导师即为聂崇岐^⑤。

四 启示及意义

清代学者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》中写道：“高明者多独断之学，沉潜者尚考索之功，天下之学术，不能不具此二途。”^⑥聂崇岐是一位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兼备的史学家，因其兼具二途，得以“率先开辟一定的研究领域”，开拓重要历史议题，“发表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论著，并为该领域培养后进”^⑦，使其无愧于“活宋”^⑧之

①中华书局编辑部《出版说明》，脱脱等《宋史》，第4页。

②此表据中华书局1977年版《宋史》和聂崇岐《校宋史本纪札记》整理而成。

③闻黎明《聂崇岐》，刘启林编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》，第272页。

④聂文华《民国时期北平四高校宋史课程教学探研》，《史学史研究》2016年第2期，第106页。

⑤何炳棣《读史阅世六十年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25页。

⑥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卷5《答客问中》，叶瑛校注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477页。

⑦曹家齐《再谈张荫麟先生之宋史叙述体系》，《徐州工程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4年第1期，第35页。

⑧聂宝璋《学者风范长存——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》，《近代中国》1998年第8辑，第265页。

誉。或正因为聂崇岐在宋史研究上的成绩卓著,研究者才将其增添到“中国近代宋史研究奠基人”之列^①。聂崇岐因宋史研究而享誉学界,其研究路径也为后学带来了若干重要启示。

第一,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。聂崇岐的宋史研究,在研究方法上明显受到乾嘉朴学的影响^②。其《宋史地理志考异》序言自谓“相互勘对,较其同异”,参以他书,“钞撮考索”^③。这与清代朴学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,为比较的研究,而求得其公则”的治学方法基本相同^④。当然,除了乾嘉朴学的影响,洪业讲授的近代史学方法,也对聂崇岐的宋史研究产生了作用,如其论文中表格的大量使用^⑤。不管是乾嘉史学,还是近代西方新史学,都蕴含“实事求是”的精神,这不可避免地会给聂崇岐的治学带来影响。聂崇岐关注宋代人物,并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。对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,聂崇岐认为:“夫论史责人,必须统观实际情形,不可就一二似是而非之根据,辄大发议论。”^⑥由此可知,聂崇岐“论史责人”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如童贯是否降金,他说:“夫贯之为,人,毫无可取,降与不降,本不足以降低或提高其人格,顾事实所在,安可妄下笔诛乎。”^⑦即使是对名列“六贼”的童贯也始终以史料作为立论依据,而不曲笔诬枉。人物评价如此,史事史学亦如此。针对宋代设词科“以为过举”的看法,聂崇岐明确指出:“第国家体制所关,朝廷应用文字,众目所瞻,亦有不容草草者,似不可以一偏之见而妄致讥评者也。”^⑧不以“一偏之见”而作违心之论,坚持实事求是,实具章学诚所言之“史德”。这或是其论著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,而示来者以轨则”^⑨的重要原因。改革开放以来,宋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,但其中也“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,主观片面性便是其中之一”^⑩。而聂崇岐在宋史研究中坚持“不苟同,不苟立异,不为高奇之论,而以至当为归”^⑪的实事求是精神,学人应当予以珍视。

第二,“通识”眼光。“通识”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概念,亦是史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有了通识的眼光,才可能鉴有定识,铨核得中”^⑫。聂崇岐先后在燕大讲授中国通史、中国史学史、中国近代史等课程,内容涵盖整个中国历史,由其主持的引得编纂“着重于十三经、二十四史和先秦诸子”^⑬,这使他能徜徉于历朝历代之间,形成“通识”眼光。而所谓“通识”,也就是“整体性思维”^⑭。因此,聂崇岐考察宋代历史并不囿于断代,而是将宋代置于历史长河中“从上到下,然后由纵及横(意即由古至今,由中央到地方及少数民族)”进行整体考察^⑮。如关注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互动,探讨宋辽关系,编纂《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》;为了宋代色役渊源,对秦汉以来的役制加以研究^⑯;思考宋代社会变化,提出“北宋——中国政治上南北势力消

① 依朱瑞熙的意见,蒙文通、陈乐素、张荫麟和邓广铭四位先生是中国近代宋史研究的奠基人(参见:朱瑞熙《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宋史学上的开创之功——兼评张荫麟、陈乐素、邓广铭三先生对宋史研究的贡献》,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《蒙文通先生诞辰 110 周年纪念文集》,线装书局 2005 年版,第 80 页)。其实,朱瑞熙的意见,是由王曾瑜转述的,王曾瑜的原话为:“朱瑞熙先生认为,中国近代宋史研究有四位奠基人物,他们是张荫麟、蒙文通、邓广铭和陈乐素先生,依我个人之见,尚须另外增加两位,他们是全汉昇和聂崇岐先生。”参见:王曾瑜《中国近代宋史研究奠基者的六十六年治史丰碑》,王曾瑜《丝毫编》,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,第 437 页。

② 闻黎明《聂崇岐》,刘启林编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》,第 271 页。

③ 聂崇岐《宋史地理志考异》,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下册,第 493 页。

④ 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朱维铮校订,中华书局 2011 年版,第 70 页。

⑤ 夏自强《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》,燕京研究院编《燕京学报》新 14 期,第 211 页。

⑥ 聂崇岐《评〈中华民族抗战史〉》,《益世报》1946 年 8 月 3 日,第 6 版。

⑦ 聂崇岐《评〈中华民族抗战史〉》,《益世报》1946 年 8 月 3 日,第 6 版。

⑧ 聂崇岐《宋词科考》,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上册,第 169 页。

⑨ 陈寅恪《王静安先生遗书序》,陈寅恪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,第 247 页。

⑩ 张邦炜《史事尤应全面看——关于当前宋史研究的一点浅见》,《西北师大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7 年第 1 期,第 80 页。

⑪ 聂崇岐《容斋随笔五集综合引得序》,朱一玄等编著《文史工具书手册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,第 725 页。另,夏自强将其视为聂崇岐“文章的追求和个人人生的写照”,具有“实事求是”的内涵。参见:夏自强《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》,燕京研究院编《燕京学报》新 14 期,第 203、212 页。

⑫ 李振宏《通史·通识·整体性:当下史学需要通识性眼光》,《史学月刊》2020 年第 7 期,第 20 页。

⑬ 聂崇岐《简述“哈佛燕京学社”》,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编辑部编《文史资料精选》第 2 册,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,第 369 页。

⑭ 李振宏《通史·通识·整体性:当下史学需要通识性眼光》,《史学月刊》2020 年第 7 期,第 21 页。

⑮ 段昌同《逝水飞尘二十年——忆聂崇岐先生》,中华书局编辑部编《学林漫录》第 8 集,中华书局 1983 年版,第 70—71 页。除了宋史研究,聂崇岐在官制研究上也不局限于宋代,而是向通史发展。参见:聂宝璋《学者风范长存——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》,《近代中国》1998 年第 8 辑,第 265—266 页。

⑯ 聂崇岐《宋役法述》,聂崇岐《宋史丛考》上册,第 1—7 页。

长之关键”这一论点,并深入探讨了南人、北人群体在北宋消长的情况及原因^①。不仅如此,究心于天水史事的他,还“打算写一部宋代通史,以补史学研究之空白”^②。在行文范围上,聂崇岐也具有这种“通识”眼光。如《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》考察赵宋320年府州军监的兴革,《宋代制举考略》探讨整个宋代的制举变迁。正是具有“通识”眼光,聂崇岐才得以“考时俗之不同,察古今之有异”^③,成一家之言。而聂崇岐在宋史研究中展现出来的“通识”眼光,或值得研究者取法,这对“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来提高唐、宋史研究水平”^④,推动“大宋史”研究,不无裨益。

第三,重视资料编纂工作。主持引得编纂长达20年之久的聂崇岐,对资料编纂工作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有较为深刻的认识^⑤。在聂崇岐看来,“收集、整理资料工作实际是研究工作的一环、一个组成部分,也是研究工作的基础。不能轻视这项工作,真正作好这项工作也非易事。资料工作首先要求博览群书,广泛涉猎,从中积累目录学知识,开扩眼界。当有一定的史识时,你就会有一个资料精选汰劣与辨伪的问题,有时还会逐渐进入欣赏资料的佳境。其实这已经就是研究了”^⑥。这段夫子自道,表明他的宋史研究正是得力于资料编纂工作。事实也的确如此。聂崇岐的宋史论著多是在编纂引得过程中“由于资料零散不完备或是互相抵牾,真相不明而引起思考的”^⑦;其论文的相关史料亦多是借编纂引得之机辑录,如搜集宋代役法材料达“数十万言”等^⑧,这也是其宋史论文史料丰赡、博引广征的原因。聂崇岐广泛搜集宋人文集传记并加以引得,不仅惠及后学,也为今天开拓史源提供了思路。宋人文集、笔记小说等虽然散失了很多,但流传下来的仍有很大数量^⑨,其中多有未经整理者,有待今人进一步发掘整理。必须指出的是,聂崇岐重视资料编辑,并非忽视基本史料。相反,聂崇岐也极为看重基本史料。他研究宋史的史料多来自《宋史》、《长编》等基本史料,还要求学生掌握所治断代的基本文献^⑩,做到史料烂熟于心,为史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。此外,聂崇岐强调“做学问‘既要专心,尚需清心’”,其埋首工作、不慕荣利的学风,也是今天亟须提倡的^⑪。

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宋史研究迄今已及百年^⑫,该领域的学者们也产生了一种“普遍的焦虑心态”,其具体表现为“研究方法的缺失感”、“对时代定位的困惑”等^⑬。面对这些焦虑,回顾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程,梳理前辈学者的学术研究,或将带来新的启示。因此,探讨聂崇岐的宋史研究,不仅是对其学术成果的继承发展,亦是学术史意义上的反思回顾,更是后辈学者同前辈学者之间的对话交流与思想碰撞。尽管时移世易,古今学人所处的环境在变,面临的问题也在变,但对史事的考索、方法的探寻、史学的追求却没有变。通过探索聂崇岐宋史研究这样一种方式,既可以在观点、思路、方法上获得启迪,也能使学术精神薪火相传,对“他日新宋学之建立”^⑭亦将起到积极作用,这或许是今天探讨聂崇岐宋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。

[责任编辑:凌兴珍]

① 聂崇岐《北宋——中国政治上南北势力消长之关键》,《大中》1946年第1卷第6期,第9—16页。

② 闻黎明《聂崇岐》,刘启林编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》,第268页。

③ 刘知幾著、浦起龙通释、王煦华整理《史通通释》,第167页。

④ 李华瑞《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——从多视角看“宋代近世说(唐宋变革论)”》,《古代文明》2018年第1期,第14页。

⑤ 夏自强曾提及聂崇岐重视资料工作,但其探讨的是聂氏在论文中使用资料的准确性。参见:夏自强《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》,燕京研究院编《燕京学报》新14期,第209—210页。

⑥ 聂宝璋《学者风范长存——记著名学者聂崇岐教授》,《近代中国》1998年第8辑,第274页。

⑦ 夏自强《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》,燕京研究院编《燕京学报》新14期,第210页。

⑧ 王蕾、梁益铭、肖鹏《聂崇岐致顾廷龙信札考释(1939—1958年)(三)》,《高校图书馆工作》2021年第4期,第83页。

⑨ 陈高华等《中国古代史史料学(第三版)》,中华书局2016年版,第263页。

⑩ 据张广达回忆:“聂先生让我先读《通鉴纪事本末》,了解重大事件的原委,再沉心静气地细读《通鉴》和胡注。他强调的是读书要沉心静气,他说,最好自己把《通鉴》标点一遍。”参见:张广达《我和隋唐、中亚史研究》,张广达《史家、史学与现代学术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,第319页。

⑪ 夏自强《至当为归的聂崇岐先生》,燕京研究院编《燕京学报》新14期,第214—215页。

⑫ 张其凡认为:“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宋史研究,是从20世纪才开始其历程的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,相对独立的宋史研究,在中国学术界开始形成。”参见:张其凡《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回顾(至2008年)》,张其凡《五代宋史论集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,第196页。

⑬ 包伟民《改革开放40年来的辽宋夏金史研究》,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2018年第1期,第66—67页。

⑭ 陈寅恪《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》,陈寅恪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,第278页。